

论洋务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影响

张雪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博士生 上海 200062)

摘要: 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它的创办和建设冲击了陈旧的科举制, 影响了近代学制的建立, 导致了近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洋务教育; 学制; 知识分子;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 52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02)12—0073—05

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它因洋务运动的内在需要而起, 又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发展, 在其作始之初并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围剿旧物和变革旧物, 成为中国文化肌体中的新质细胞。与戊戌维新时期的“除旧布新”不同, 洋务派在“布新”的同时并不“除旧”, “布新”而不“除旧”是洋务运动的特点, 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但“布新”的结果又必然会冲击旧的防线, 威胁到旧的存在, 从而促进社会的新旧嬗替。洋务教育冲击了传统的旧教育, 不能不影响于近代的新教育。本文试就洋务教育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冲击了陈旧的封建科举制度, 影响了新型学制的建立

洋务教育独立于传统教育体制之外而自成一个系统, 但在科举成为唯一正当、足以光宗耀祖的晋身阶梯的社会、在“功名”意识与“富贵”观念沦肌浹髓的时代, 在传统的取仕标准没有根本改变、新的标准尚未确立之前, 创办洋务教育又不能不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科甲正途”的功名价值观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强有力牵制和局束, 如在生源问题上, 洋务派在冲破云山雾嶂而后创办的各类学堂却没有招徕广泛的应考者, 那个时候, “世家有志

上进者皆不肯就学”, 而寄热望于“章句弓马”, 所以“只能招募簪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1] 鲁迅后来曾回忆道: “那个时候读书应试是正路, 所谓学洋务, 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 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 更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2] 鲁迅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 已是戊戌维新的时代, 其社会风气尚且如此, 更遑论洋务运动时期! 在人才风气固结不解, “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的现实面前, 洋务派除了放宽对报考者的年龄限制和降低对文化知识的要求之外, 又面临着一个如何激励生徒, 并把他们吸引到洋务学堂中来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学堂一般都采取“优给月廪”的物质激励和“量予登进”的出路保障两种办法以广招徕, 解救洋务教育的困窘。但前者不仅增加学堂的经费负担, 而且容易使“始愿不过希图月间膏火”的学生敷衍岁月; 后者则有把学生引向科举而“不复用心西学”之弊, 因此都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洋务时期为了解决学堂和科举的矛盾, 不断提出了变通科举的主张。1870 年闽浙总督英桂、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等奏开算学科, “以格于成例中止”。^[3] 1874 年李鸿章重提旧议, 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对科举考试提出异议, 提出两条建议: (1) 稍加变通考试功令,

“另开洋务进取一格”。(2)在有海防的省份设立“洋务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一并着力讲求，所学如有成效者，则分别文武，奏奖升级，“与正途出身无异”^[4]。1887 年，江南监察御史陈莹上奏，建议将数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明习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举出身，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第一次将“西学”和“中学”同考。戊戌变法前夕，总理衙门采纳贵州学政严修之议，开设经济特科，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项，附乡会试。增设算学科和经济特科，在科举考试内容上是一大革新，算学科虽在唐代已开办过，当时称为明算科，但以后即在科举考试中停止举办，到洋务运动时期正式列为科目，至于经济科中理财、考工、外交等科，则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改革是冲破专以经义、八股取士的科举网罗的初步尝试，开戊戌变法时期科举改革的先河，洋务教育已涉及到科举制度的兴废上。

戊戌维新时期，变革科举制度成为了朝野上下共同的呼声。1898 年 6 月光绪帝下诏废止八股、停止科举，中国教育经历了一场巨变，一面推倒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又一面建立起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尽管戊戌政变使一场改革化为泡影，但传统教育体制的崩溃已成为时代的趋势。1901 年经过庚子事变，清政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教育改革，颁布统一的学制，制定新的教育章程，新的近代教育体制建立起来。

由于中国特殊的教育改革背景，近代教育体制明显体现了它的急功近利精神。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洋务教育作为为现代化初始阶段服务的产物，它的育才模式（教学方法、内容、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方式等）、主导精神、成效和弊端，无不直接影响了晚清现代教育的建立，体现和反映出中国近代教育的特点。考察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学制”），特别强调外语教育、实业教育和军事教育，在整个学制中占了极大比重，这种状况和洋务教育是直接关联的。1904 年 1 月颁布由张之洞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直接体现了张之洞的洋务教育思想。《学制》将实业教育提到较突出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实业学堂除附设艺徒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

外，分为初等（修业三年，相当于高小程度，包括农业、商船、商业三类），中等（修业预科两年，本科三年，相当于中学程度，有农、工、商业和商船四类）和高等（修业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相当于大学程度，分类同中等）三级实业学堂，还制定相应的实业学堂教员讲习所，商业教员讲习所等规章，实业教育在学制中占重要地位，形成了一个与普通学校并行的独立体系。中国近代教育对实业教育的重视是洋务教育以来重器技，急于自强求富的的功利主义的反映，是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偏重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它随清末提倡振兴实业，所设越来越多。“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5]

洋务教育时期，各学堂普设外语课，学堂大多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授课，外语被作为重要的科目列入教学计划之中，对外语教育的重视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的课程设置，按“壬寅”、“癸卯”学制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均要开设外语课，在《学务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中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最大，斯实通中外，消乱贼、息邪说，距波行窥之要也”在中学里规定外语教学前 3 年每周 8 学时，后 2 年每周 6 学时，仅次于读经时数，外语作为探求自强求富的契机，一直被重视。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中特别加强军事建设。清政府在 1905 年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 36 镇，全面推行军事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推进军事教育各项措施的推展，练兵处和兵部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教育章程，制定了各类陆军学堂章程。据统计，1902 年以后，全国新办的各类军事学堂 40 所，1903 年以后的中国新式学堂，普遍开设军事训练课，在高等学堂中增加 3 学时的军事学，讲授不同国家的军事制度、军事史、战略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性、救国性。

外国教育、科技教育、军事教育是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在近代学制中都明显占到了系统重要的地位。教育内容直接与国家社会需求相结合，近代学制对它们的重视实际上也是洋务教育的继续、扩大、系统化和制度化。

近代学制确立的教育宗旨“中体西用”，也渊源

于洋务时期的教育宗旨。洋务时期各类学堂作为初创的近代新式学堂,当时还未明确规定教育宗旨,在指导思想上是自以自强求富为出发点,但在具体教学、课程设置上已体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在重视西学科技,格致课程的引进时,十分强调中学内容的学习。洋务派恪守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用,认为向西方学习只能限于船坚利炮,而绝不能学习西方的政教文化,如曾国藩、李鸿章合奏的选派幼童赴美所定章程中便规定:学童到美国后,除学西艺外,还必须课以《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而且“每遇房、虚、昂、星等日”,还要“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6]这是洋务教育的一个限制。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宗旨正是从这基础上形成的。它由张之洞这个洋务教育家在《劝学篇》中将它系统化,而明确下来,此后即以“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作为教育宗旨。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将“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作明文规定下来,指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这是把封建纲常中的“忠孝”和儒家经典的经史之学,作为办学的根基,同时在教学的内容中,又特别重视经学课程,从初等小学到大学院所占学时最多,这与洋务学堂的规定是差不多的。学制把“中体西用”作为办学的宗旨,这实际上是洋务时期中体西用的法令化、官方化。所有学制内容实际上都是洋务教育各自为政、分散、无规划上的统一和系统化,洋务教育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形成。

二、导致了近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洋务学堂在讲授西学,吸取“声光化电”等西洋长技的过程中,催化了近代中国第一代知识者,为中国近代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输送了不少有用的专门人才。依靠他们,各项新式洋务事业才可能逐渐改变依靠洋人的局面,达到自立。如上海,“广方言馆开馆前后42年,就曾培养出500—600名这样新型的人才,他们或任职于外交部门,或充任海关翻译,或投身于实业,或任教于学堂,在中国近代外交、教育、文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中陆征祥、胡惟德代理过国务总理,担任过外交总长,还有9人担任过驻外公使,至于担任过各种学校

校长,教习或充任翻译的人则更多。一位广方言馆的学生颇为自豪地说:“一馆之中,极勋位于首辅,展奇韬于秘府,遍使节于环球,振古以来未有名斯之盛也”^[7]洋务教育在育才方面的成就,在出洋留学生尤其是留欧学生中表现的尤为显著。除了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显赫贡献的严复、詹天佑外,还出现了像魏翰、郑清濂那样具备独立设计制造船、枪炮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叶祖、林泰曾、刘步蟾、萨镇冰那样的军事人才,他们对中国的现代事业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如福建船政局,在辞退法国技术人员工作,留学回国学生组成制造工程处,独立设计制造,从1875—1908年,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制造了大小兵船、商船“已达40号”,质量也是上乘,可与洋货媲美。据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895年的奏疏中说:各省前在外洋订购之“南琛”、“南端”等船均不如福建船政局所选之“开济”、“寰泰”、“镜清”及上海制造局所造之“保民”等船,此臣在南洋所目击者,则亦何必舍己求人,舍近图远。与传统士大夫相比,他们在知识结构和人生价值取向上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仅或多或少地具备了一定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对中国外部的世界也有了相当的了解。虽然,这一批新型的知识者的人数极其有限,个人的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但对于否塞已久的中国社会来说,他们又是一种新生的异质力量。“正像一颗投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的石子,它虽不能使水花四溅,但未尝不激起逐渐扩大的圆波,进达极远的地方。”^[8]容闳在谈到留美学生被撤回的情形时说“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何种变迁,皆不能忘也”^[9]这种通过比较中西而得来的切肤感受和潜在意识,在后来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来去中的表现并不一致,但在当时却无疑在为社会新思潮推波助澜,成为革新社会的力量。中国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固然是民族危机的推动下所发生的政治、思想运动,但这些运动又无不从西学中寻找精神武器,那些安坐旧营垒的士子之所以能转变成改革者、革命者,都借助于新式学堂教育。维新著名

人士严复,被称为“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就是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出来的重要知识分子,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唐才常、傅慈祥、黄兴和宋教仁也分别是湖北两湖书院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启蒙和先锋战士的作用。

三、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价值观念,作为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识,一旦形成,就有巨大的稳定性,它不仅影响人们的行为、举止、活动,而且往往成为维护旧制度的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为政以德,重德轻技,德成而上,艺成于下是封建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作为选择和判断行为的标准,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主要通过教育体现和传播。在教育中,它以传授、讲解、阐发儒家精神为内容,视自然科学为雕虫小技;培养目标上,注重做人教育,偏重道德,“学者,学为人也”,以行仁为做人的实践方法,强调造就有德君子,拒绝培养工艺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重视人文学科,轻视科技;教学方法上,主静斥动,排斥社会实践活动。科举制度建立后,在传统观念中,读书做官是极其荣耀的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科举制度建立后,读书做官更加合理化,统治者通过考试,确定范围、内容、方法,又不断强化这种价值观念,而从事技艺更是被斥为末技为不齿之业,这种传统观念一直是维护旧社会结构的强大力量。洋务运动在作始之初和进展过程中无不受到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和控制。从洋务教育角度看,京师同文馆是否增设天文、算学之争,容闳的教育计划与陈兰彬、吴子登的冲突矛盾,洋务学堂内科举与学堂的矛盾等等,都深切反映了传统惰性力量的不可估量,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就是一个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省过程,洋务教育的创办本身就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在教育中,由于新质的引入又必然导致旧物的变化,中国旧教育中考科举求功名,技术的价值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洋务教育虽没有直接冲击科举制度,但由于“科学渗入科举”,又会导致取士标准的改变,而取士标准的改变又势必会动摇科举制度的根基。当时新式

学堂的毕业生一般都有比较好的出路。京师同文馆学生不仅有许多人充任了遣外人员或外交官,而且“亦有参与内政,任各地知县政府的,有加入电报局,或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之要职的”^[10]知识者不必经由科举也可以跻身于仕途,或谋到其它职业的,也就是说知识者在科举考试由士而仕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和途径。考科举求功名不再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相反,“风俗丕变,士子应科试者少”^[11]光绪时期,中举人、贡生人数历年递减。下面的一个不完整的统计数可以说明:^[12]

举人

1875——1879 年	5 人	平均每年 1 人
1880——1889 年	6 人	平均每年 0.6 人
1890——1902 年	4 人	平均每年 0.29 人

贡生

1875——1881 年	9 人	平均每年 1.29 人
1882——1888 年	7 人	平均每年 1 人
1889——1895 年	5 人	平均每年 0.71 人
1896——1902 年	6 人	平均每年 0.86 人

另一方面,受西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甲午战争以后,更是社会价值一大变。甲午战争前,由于旧的势力的浓重,新学堂只是凤毛麟角。战后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6 年五年间,新办学堂达到 107 所,比甲午战争前有成倍的增长。从办学速度看,战前 33 年办学堂 25 所,平均每年增长不到 1 所,战后平均每年增加 21 所;以分布看,战前设在少数沿海港口城市的学堂有 19 所,占总数的 27%弱,战前只有 7 个省份有学堂,战后学堂已分布在包括云、贵、川、陕在内的 17 个省份,不少府、州、县也办起了学堂;种类上,战前军事学堂 9 所,占 36%,工艺学堂 6 所,占 24%,其他普通学堂 10 所,占 40%,战后普通学堂发展较快,有 87 所,占 87%,其中还有 2 所女学堂。这种随社会结构变化而来的机会和途径,毫无疑问会冲击依附于科举制度的功名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洋务教育所传播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又给中国人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个天地,迫使人们重新认识被黜为“奇技”的科学技术价值,改变固有的“重义理,轻艺事”的价值观念,逐渐承认“艺事”即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有用之

学。所谓“中国人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13〕}正是洋务事业推展之后而获得的认识，并成为自觉引进西方科技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

从现代化的角度上看，洋务教育作为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是现代化的保证。洋务派对教育的改革和倡导，是顺应现代化潮流。洋务派所建立的新式教育体系，开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也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它与洋务运动一起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起了不可忽视的先导作用。

万事开头难。洋务教育作为区别于传统教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体系。两种教育制度并存导致了二者的彼此影响。和许多新生事物的分孽和繁殖相比，洋务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是极为严峻的！洋务教育在冲破重重障碍和层层梗阻过程中，又受制于无往而不在的封建阻力和传统观念的潜网，它所采用的具有现代变革意义的措施，往往被套入了传统的框架，他们希望并切实进行现代化改革，却试图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来维护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求现代化变革的依据。洋务派采用的调和、中庸的近代化运动原则，限制了它的发展，在创设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同时强调传统学术，并且还将现代的新式教育纳入传统的科举制中，“专设一科取士”^{〔14〕}视西方的先进东西只是辅助性的“富强之本”，洋务派试图将近代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强调中国伦常纲要是根本，在积极引进西方器物技术时坚持排斥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这种局限无疑限制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事实上，洋务时期教育所取得的成效是很有限。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曾就洋务教育做了批判。他说：“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才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不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学徒，但杂欧西下等人之恶习，

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楨、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堂、自强学堂、铁路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长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15〕}梁启超的批评似乎过于激烈了点，但也不能不由此看到洋务教育还很不完善，一切教育近代化问题都不过是一种雏形，且带有许多封建主义的印记，如学堂管理机构的重叠臃肿，官场恶习等充斥其中，即其明证。但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因为有了洋务教育的建设，才有了后来新政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更新，才导致了近代教育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洋务教育的先行意义不能忽视。

注释：

〔1〕《津门杂记》卷中，第 20 页。

〔2〕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27 页。

〔3〕《洋务运动》（二），第 210 页。

〔4〕李鸿章：《筹办夷务折》，《李鸿章全集·奏稿》，卷 24。

〔5〕《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

〔6〕《洋务运动》（二），第 158 页。

〔7〕吴宗濂：《上海广方言馆始末记》，《京师同文馆学友第一次报告书》前附。

〔8〕《西学东渐记》。

〔9〕毕乃德：《同文馆考》，《学制史料》第一辑上，第 205—206 页。

〔10〕〔11〕《定海县志》第二册。

〔12〕《左宗棠集·书牒》卷 9。

〔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

〔1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 83—84 页。

〔责任编辑：兆 录〕